

拉斐尔前派绘画中女性悲剧隐喻研究

邵弓彤

河南大学美术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0

DOI:10.61369/HASS.2025100018

摘 要 : 拉斐尔前派作为十九世纪英国重要的艺术流派, 其绘画作品以细节真实、色彩浪漫以及赋有情感著称, 其中大量绘画呈现了对女性命运和对美的关注, 蕴含着丰富的隐喻意义。本文以拉斐尔前派中女性悲剧题材绘画为研究对象, 从历史文化语境、具体画作比较及女性意识觉醒三个方面, 对画中女性悲剧隐喻符号展开研究。具体分析维多利亚时代繁荣表象下的精神危机和男性创作者塑造的悲剧女性所具有的双重角色内涵, 选取代表性作品《奥菲利亚》与《夏洛特姑娘》进行悲剧叙事比较, 剖析作品中悲剧的呈现方式及隐喻符号, 从而进一步揭示在维多利亚女性主义思想影响下悲剧故事中女性从被动牺牲到主动觉醒的转变, 深入理解拉斐尔前派绘画中女性悲剧题材所承载的社会文化内涵。

关 键 词 : 拉斐尔前派; 奥菲利亚; 夏洛特姑娘; 维多利亚时代; 女性主义

A Study on the Metaphor of Female Tragedy in Pre-Raphaelite Paintings

Shao Gongtong

Fine Arts College of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0

Abstract : As an important art movement in 19th-century Britain, the Pre-Raphaelite School is renowned for its paintings, which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ir realistic details, romantic colors and emotional connotations. A large number of its paintings present concerns about the fate of women and beauty, and are rich in metaphorical meaning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paintings of female tragedies in the Pre-Raphaelite School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onducts a study on the metaphorical symbols of female tragedies in the paintings from three aspect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comparison of specific paintings, and the awakening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This paper specifically analyzes the spiritual crisis beneath the prosperous appearance of the Victorian era and the dual role connotations of tragic women created by male creators. It selects representative works "Ophelia" and "The Lady of Shalott" for a comparison of tragic narratives, and dissected the presentation methods and metaphorical symbols of tragedies in the works. Thus, it further reveals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men from passive sacrifice to active awakening in tragic stori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Victorian feminism, and deeply understanding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carried by the tragic themes of women in Pre-Raphaelite paintings.

Keywords : Pre-Raphaelite; Ophelia; The Lady of Shalott; the Victorian era; feminism

一、女性悲剧主题的历史文化语境

(一) 维多利亚时代繁荣背景下的精神危机

十九世纪英国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 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经济飞速发展, 殖民地遍布全球, 社会物质财富急剧增加, 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铁路网络纵横交错, 机器生产取代了传统的手工劳动, 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然而, 这种物质上的空前繁荣并没有带来精神上的同步富足, 反而引发了严重的精神危机。

正如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文化与社会》中所论述的, 工业革命带来的不仅是生产方式的变革, 更是社会结构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工业化与城市化导致传统社会结构瓦解、基督教受到科学发现的冲击而造成信仰动摇、贫富差距悬殊以及道德的虚伪, 种种现象催生了对于精神性、情感深度与真实性的渴求。这种精神危机在艺术领域表现为

拉斐尔前派的应运而生, 拉斐尔前派艺术家们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的矛盾, 他们通过描绘女性的悲剧命运探索人性复杂、社会压抑与命运无常, 映射了繁荣表象下的个体痛苦与精神困境。

(二) 取材于文学诗歌的爱情悲剧故事

拉斐尔前派艺术家深受中世纪复兴潮流及浪漫主义文学影响, 大量从莎士比亚、但丁、中世纪传奇以及同时代诗人例如丁尼生等人的作品中汲取灵感。这些文学源头提供了丰富的、具有强烈戏剧张力和情感冲击力的女性悲剧形象。例如约翰·埃弗里特·米莱斯(John Everett Millais)的《奥菲利亚》(Ophelia)直接取材自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奥菲利亚溺亡的场景。约翰·威廉姆·沃特豪斯(John William Waterhouse)多次描绘丁尼生诗歌《夏洛特姑娘》(The Lady of Shalott)中的主角, 讲述因诅咒被困塔中、只能通过镜子观察外界, 最终因直视现实而走向死亡的女子。但丁·加百利·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的《贝娅塔·贝娅特丽丝》(Beata Beatrix,c.)灵感也源于但丁《新

生》中早逝的贝雅特丽齐，带有悼念亡妻伊丽莎白·西达尔的自传色彩。其他如《玛琳娜》（Mariana）等诗歌也常被描绘。

这些文学原型中的女性角色往往因其爱情受阻或爱情背叛以及对社会规范的逾越而遭遇悲剧结局，为艺术家提供了探讨命运、压抑与牺牲的经典叙事框架。

（三）男性创作者手下悲剧女性的双重角色

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群体存在着制度性压迫与社会性规训的多重困境。其一是维多利亚时代，夫妻离异条件较为苛刻，一旦确定夫妻关系，将难以分离，要求两者必须在一起，否则将会受到社会的批判^[1]。在1832年《已婚妇女财产法》颁布前，英国传统女性婚后即丧失独立法人资格，其婚前财产及婚后所得均归属丈夫，依附性成为制约女性发展的根本枷锁。

其二是从社会观念层面上看，精神的空虚使得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对“家”有强烈依赖感。认为“家是宁静之地，是避难所，这里没有伤害，也没有恐怖和疑惧”^[2]，家就是封闭且安全的城堡，男性是主人，女性是温柔贤惠的壁炉旁的女神即“家庭天使”（Angel in the House），这样的意识形态主导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别角色认知。他们否认女性接受教育的权利，把女性视为家庭的装饰，认定女性只为愉悦男性而生^[3]。此外，宗教教义强化也“女性从属论”，如保罗书信《以弗所书》中“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将“妻子当顺服丈夫”的训诫转化为社会行为准则。

拉斐尔前派以描绘情感细腻的女性形象为一大突出点，却也难以逃将女性扁平化赋予隐喻符号的狭隘。在大量书写拉斐尔前派传记或故事中，男性都处于绝对地位，关于女性描述与“模特、缪斯、妻子以及情人”等词语赋值，例如伊丽莎白·西达尔（Elizabeth Siddal），以《奥菲利亚》绘画作品的模特、罗塞蒂的妻子被人了解，但其后半生独特的水彩作品和女性画家身份却鲜为人知。

在拉斐尔前派男性艺术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往往也承载着复杂且时常矛盾的双重角色：其一是她们常被描绘成具有超凡脱俗之美的典型，拥有浓密的红发、精致的面容、沉思或忧郁的神情、象征性的姿态。她们的身体与情感痛苦被转化为一种高度审美化的对象，满足了艺术家对理想美例如“致命女性”或“圣洁女性”的追求与维多利亚时代对“家庭天使”形象的某种迷恋^[4]，是美学理想化对象的艺术表达。其二是尽管被审美化，这些女性形象也常常隐晦或直接地承载了对维多利亚社会性别规范、阶级压迫、情感压抑的批判。奥菲利亚的疯癫可解读为社会对女性自主性的压制结果；夏洛特女郎的囚禁与毁灭象征女性被剥夺直接体验世界的权利；罗塞蒂笔下的女性常带情欲与精神痛苦交织的复杂特质，挑战了社会对女性“纯洁天使”的单一设定。她们的悲剧命运成为艺术家反思社会不公、人性枷锁的媒介，是道德与社会批判的艺术载体。这种双重性反映了艺术家自身作为时代观察者的矛盾立场：既沉浸于对女性美的浪漫幻想与艺术塑造，又试图利用这些形象触及社会现实与道德困境。

二、《奥菲利亚》与《夏洛特》的悲剧叙事比较

约翰·埃弗里特·米莱斯（John Everett Millais）的《奥菲利亚》（Ophelia）与约翰·威廉姆·沃特豪斯（John William Waterhouse）《夏洛特姑娘》（The Lady of Shalott）两位画家均以自然景观为悲剧的“容器”，通过细节符号与身体语言，将悲剧命运转化为视觉叙事，但图像的指向性呈现出死亡命运的“被动接受”与“主动反抗”的分野。

（一）《奥菲利亚》中自然作为“死亡圣礼的接纳”

米莱斯（John William Waterhouse）精细地描绘了奥菲利亚的死亡场景，她漂浮在溪流中，四肢舒展如睡莲，裙摆与散落的花朵构成自然与身体的共生。画面中的水面平静无波，柳枝低垂如帘，整个自然环境呈现出一种“温柔的残忍”。它并非大张旗鼓的阐述命运的绝望，而是平静地接纳了这具失去生命力的躯体。奥菲利亚的姿态完全“不抵抗”，面部表情祥和，双眼轻阖，手臂自然张开，完全放弃了对死亡的抵抗。这种姿态隐喻十九世纪英国社会对女性的规训，女性被期待被规训为“沉默的客体”，需服从男性权威例如父亲或丈夫，却无权参与公共事务或自主选择命运。奥菲利亚的精神失常与死亡，本质是对这种规训的结果呈现，当她无法在“女儿”与“恋人”的身份中自洽时，唯有通过毁灭自我完成“退场”。奥菲利亚的悲剧本质是被卷入哈姆雷特的复仇计划与波洛涅斯的家族控制，最终成为男性世界权力冲突的牺牲品。

（二）《夏洛特姑娘》中自然作为“命运通道的见证”

沃特豪斯（John Everett Millais）的《夏洛特姑娘》画面中，夏洛特被认为成“堕落的女性”，被称为“人类灵魂在面对既定责任时的失败”。她乘坐在驶向死亡的小船上，船尾堆满即将沉没的织物是她多年织就的毯子，毯子上的图案依稀看到她通过镜子看到的世界，城堡、塔楼与骑士显示着她被禁锢的过去这些高墙、塔楼、孤岛层峦叠嶂地把夏洛特阻隔在闺房之内^[5]。河流蜿蜒指向远方，天空阴沉，岸边芦苇萧瑟，船头三根蜡烛中两根已被风吹灭，暗示她的悲剧命运。然而与奥菲利亚的平静不同，夏洛特的身体语言充满主动性：她头部微扬，眼睛斜看，手中拿着的铁链象征着她释放恐惧而奔向自由的期盼，在告别过去的囚禁。自然环境在此并非死亡的接纳者，而是她主动选择的“路径”，河流是她驶向毁灭的载体，芦苇的萧瑟是悲剧的预告，皆因她的主动姿态而成为了“反抗的见证”。

（三）隐喻符号下规训体系中的女性困境

米莱斯（John Everett Millais）的《奥菲利亚》聚焦于“规训的内化”。奥菲利亚的身份是贵族少女，其行为被严格限定在“顺从”与“纯洁”的框架内。她必须服从父亲的安排，必须符合哈姆雷特对“理想女性”的期待。当这种期待崩塌时，她的精神世界随之瓦解。她的死亡被美化成自然的回归，本质是社会对“失控女性”的最终处理。通过将悲剧浪漫化，掩盖父权制度对女性主体性的剥夺。而《夏洛特姑娘》则揭露了“反抗的虚妄”。夏洛特的命运是个体欲望对规训的挑战结果，但丁尼生的诗歌与沃特豪斯的画面共同指向一个残酷事实：在封闭的规训体系中，任

何反抗都注定以毁灭告终。她的织物象征女性被赋予的“家庭劳动”价值，而这种价值在她追求自我时便失去意义。当她扯断丝线进行反抗就必将走向灭亡。这种悲剧隐喻了十九世纪女性即使主动打破规则，也会被既定秩序以“宿命”之名摧毁，最终走向“死亡”。

两幅作品的悲剧隐喻均超越了个体命运，指向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在“家庭天使”的社会规训下的集体困境。

三、悲剧故事中的女性意识觉醒

（一）从被动牺牲到主动觉醒

从上述拉斐尔前派两幅代表性女性悲剧绘画作品，展现了一个关键的转变轨迹：女性从被动牺牲者转为带有主体性的觉醒者。

奥菲莉亚的悲剧命运主要源于外部力量如哈姆雷特的疯狂和父权家庭的变故来揭示社会对女性情感的压抑，她最终的精神崩溃与溺亡更多表现为一种无力抵抗后的宿命性结局，是父权社会结构与男性行动的直接牺牲品。

夏洛特姑娘的形象则标志着一个转折。她并非完全无知或被动承受诅咒。沃特豪斯所描绘的夏洛特三部曲讲述了夏洛特从被诅咒到为爱赴死的三个代表性瞬间，其中她主动扯断丝线、转身、直视窗外的真实世界再到走向灭亡。这一系列动作是清醒的、有意识的抉择。她明知诅咒的后果，却依然选择打破禁锢，追求真实的感知和爱。她的死亡，是觉醒后行动的必然结果，具

有强烈的自主性色彩，某种程度上映射出了为追寻独立和自由而付出巨大代价的女性殉道者的形象^[6]，这种反抗是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故事的死亡结局是主体为挣脱牢笼、追求真实自我所支付的终极代价，女性从一个被诅咒囚禁的被动受害者，转变为以生命为代价争取认知自由与情感真实的主动反抗者。

（二）维多利亚女性主义思想支撑

拉斐尔前派绘画中女性意识的觉醒，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主义思想密切相关。拉斐尔前派活跃的时期，恰逢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女性主义运动第一次浪潮兴起^[7]。以芭芭拉·雷·史密斯·博迪尚（Barbara Leigh Smith Bodichon）为代表的活动家，围绕已婚妇女财产权、受教育权、选举权、道德双重标准等问题展开激烈讨论与抗争。

这些运动挑战了“家庭天使”的理想女性形象，呼吁女性自主权与独立人格。在此背景下，艺术家虽然本人未必是自觉的女性主义者，但其女性形象的创作客观上与当时逐渐兴起的性别平等思潮存在呼应。拉斐尔前派绘画中对女性悲剧命运的具象化描绘，可以被视为对女性社会处境的隐喻性批判。绘画中的反抗可被解读为对女性争取直接认知世界、掌握自身命运之权利的象征。

需要注意的是，正如上述所提到的女性角色的“双重性”，这种“觉醒”很大程度上仍由男性艺术家塑造，受限于他们的视角和时代局限，其形象仍带有强烈的审美理想化甚至情色化色彩，其反抗常以毁灭告终，反映了社会对女性突破规范的深刻恐惧与惩罚，为当时及后世观众提供了思考空间。

参考文献

- [1] 阳烁. 女性主义角度下维多利亚时代父权制下的婚姻观批判 [J]. 黑河学院学报, 2022, 13(9): 131-133.
- [2] JAandOliverBanks. FeminismandFamilyPlanninginVictorianEngland[M]. NewYork: SchockenBooks, 1964:59
- [3] 傅燕晖.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早中期家庭意识形态探析 [J]. 北方论丛, 2017(2): 102-109.
- [4] GeorgeLevine, HowtoReadVictorianNovel[M]. Malden: BlackwellPublishing, 2008.
- [5] 张丽. 从《夏洛特姑娘》看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困境 [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9, 27(4): 65-67.
- [6] 方慧佳, 刘波. 《夏洛特女郎》中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形象研究 [J].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4, 30(7): 31-32.
- [7] 傅燕晖.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中产阶级女性解放运动论略 [J]. 北方论丛, 2014(2): 100-104.